

# 西藏带柄铜镜补论

吕红亮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成都, 610064)

**内容摘要:** 拉萨曲贡遗址石室墓中出土的铁柄铜镜曾引起广泛讨论, 遵循既有研究提出的思考路径, 本文补充介绍了收藏于法国的一面西藏带柄铜镜, 并结合欧亚草原早期带柄铜镜, 从形制和镜背刻纹两方面对西藏带柄铜镜的来源做了补充讨论, 认为西藏出土的三面带柄铜镜, 虽从大的系统来看, 属于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游牧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但其具体来源则较为复杂, 是欧亚草原带柄镜中较为特别的类型, 其源头可能并非自西藏北部经新疆传入, 而很可能源自中亚南部或印度北部一带经过西藏西部传入, 且可能经过了本土艺术家的改造。

**关键词:** 曲贡遗址 带柄铜镜 西藏 欧亚草原

## 一、西藏带柄镜的发现与既存认识

1990年, 西藏拉萨曲贡遗址发掘的一批墓葬中曾出土1件带柄铜镜(编号为M203:2)(图一:1), 引起多位学者注意, 被认为是“迄今为止西藏高原首次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之物”<sup>①</sup>。一些学者敏锐意识到这面镜与中国传统早期无柄铜镜系统相当不同, 而与中亚、甚至南亚的带柄铜镜相关。<sup>②</sup> 1990年, 德国考古学家容格(N. G. Ronge)等人在德国《普通与比较考古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这件铜镜的资料并做了讨论(图一:2)。<sup>③</sup> 在这篇论文的标题注释里, 容格等还提及收藏于法国的另外一面出自西藏的带柄铜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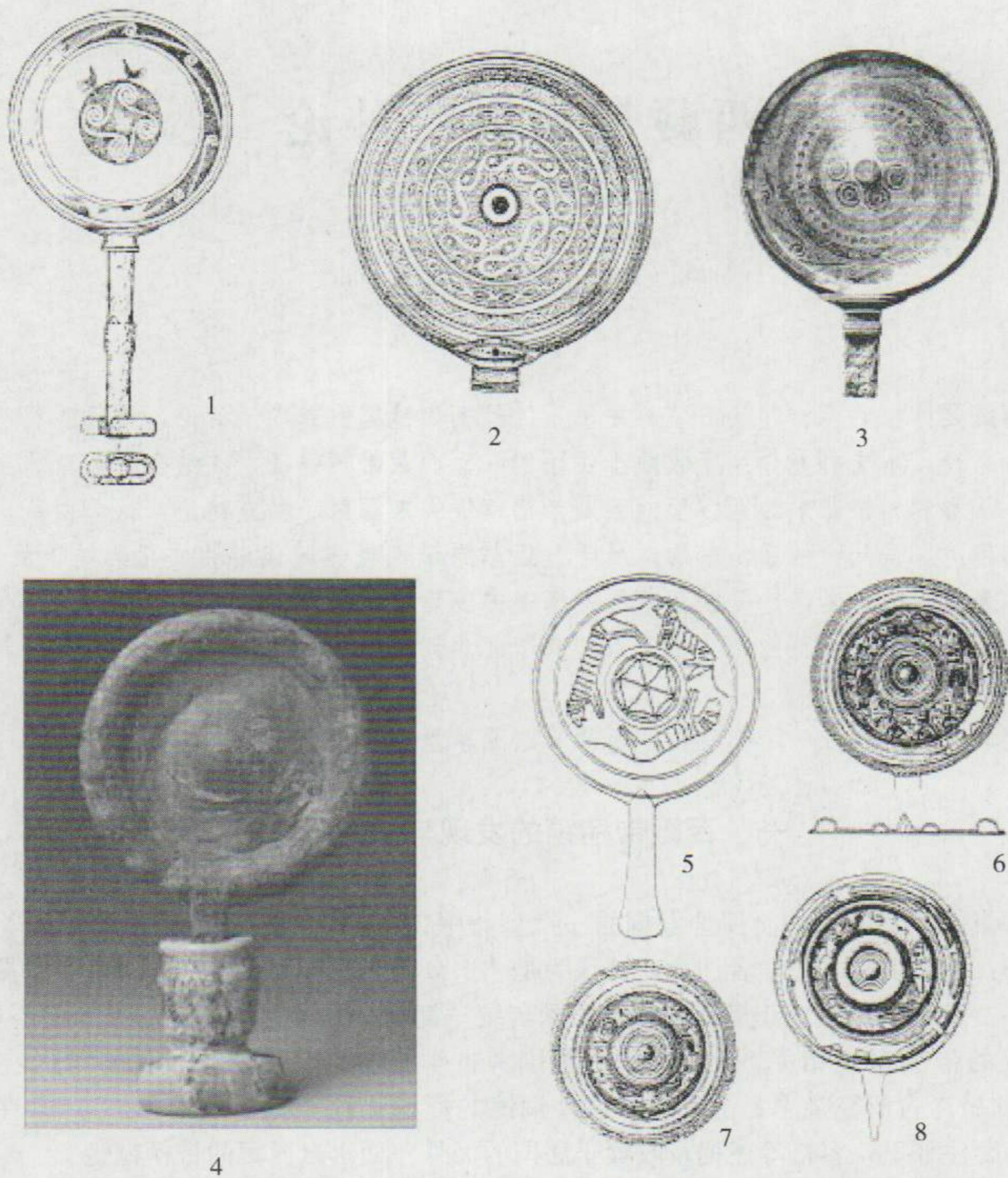
1994年, 法国著名藏学家安·察耶特(Anne Chayet)出版了《西藏考古与艺术》一书, 其中公布了1件现收藏于法国据云出自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带柄铜镜的照片(图一:3)<sup>④</sup>。笔者推测, 这面镜应该就是容格文章中提到的出自西藏南部收藏于法国私人收藏家之手的“另一面类似的铜镜”。这面铜镜在造型上与前述二镜大同小异, 尤其是其镜面与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队:《拉萨曲贡》,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208页, 图145、彩版4。更清晰的彩版参见: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宝藏》,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0年版。

② 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 载《考古》1994年第7期; 赵慧民:《西藏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的相关问题》, 载《考古》1994年第7期; 霍巍:《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 载《考古》1997年第11期; 霍巍:《从新出考古材料论我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 载《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

③ N. G. Ronge, V. Ronge, H. G. Hüttel, Ein eisenzeitlicher Spiegel aus Tibet, *Beiträ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9-10, 1990, pp. 225-242. 此文的中译本见: N·G·容格、V·容格、H·G·希特尔:《西藏出土的铁器时代铜镜》, 朱欣民译, 《西藏考古》第一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第189~199页。

④ Anne Chayet, *Art et Archeologie du Tibet*, Paris: Picard, 1994, p. 59, Fig. 33.



图一 西藏及周边地区的带柄铜镜

1. 拉萨曲贡 M203; 2. 德国私人收藏 3. 法国私人收藏 4. 阿富汗西伯尔汗墓葬  
 5. 西伯利亚 Bystrovka 墓葬 6. 阿尔泰 Rogzikha 墓葬 7. 阿尔泰 Lokot 墓葬  
 8. 南乌拉尔的 Mechetsai 遗址

柄部的链接基座几乎与曲贡出土者雷同，镜背纹饰构图则与德国所藏者相似，柄部亦为铁质。

综合目前资料，可以有把握的说，在西藏拉萨河谷一带至少曾经出土 3 面彼此类似的带柄铜镜。而据容格等人的口述调查，西藏一些佛教寺院也收藏了这类遗物。就目前的资料而言，似乎这类带柄镜主要流行于藏南河谷。但霍巍先生曾指出，在札达东嘎 2 号窟的天井所绘曼陀罗中绘有 2 副手持带柄镜的人物形象，表明“西藏西部也曾流行过带柄镜，

而且流行的时间还相当长，至少延续到吐蕃王朝以后”<sup>①</sup>。有关此点，还可补充另外两条资料。

1909年，弗兰克在印藏边界调查期间，曾于拉达克列城附近发现一处墓葬。弗兰克提到墓葬出土物中有1件带柄铜镜的残片，并且认为当时的拉达克仍然可以见到此类器物。该书图版 Palte. XXIX-a 中处于正上方的一件器物很可能为带柄铜镜<sup>②</sup>，但由于照片过于模糊，较难确认。不幸的是，目前这批器物已经佚散。

另外，近年德国考古学家在尼泊尔的穆斯塘地区琼嘎（Khyinga）遗址也曾发现铜镜，不过年代较晚，属于公元8世纪至9世纪的遗物。<sup>③</sup>有学者认为，这面铜镜在形制上和西藏腹心地带发现者非常相似，如边缘都带有凸棱，且都以织物包裹，所以不排除其为早期铜镜晚期利用的可能性<sup>④</sup>。以上材料都显示出，带柄铜镜可能在西藏西部及其周边地区流行过。

有关拉萨曲贡带柄铜镜的讨论集中在于两个方面：年代和来源。多位学者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阐发，一般将其年代定在战国至汉之际，在目前没有可靠测年证据之前，考虑到铜镜的传世特征，这一稍显模糊的年代目前尚无法进一步精确，基本可信。至于艺术风格的来源影响问题，则较为分歧。如赵惠民先生倾向与南亚北部的带柄镜之间的关系，德国学者 Hüttel 则尝试构造出这面铜镜在形式上与汉镜、纹饰上与滇或东山乃至所谓“黑海艺术”的关联，霍巍先生则提出了一个从中亚新疆至西藏西部然后东渐入横断山区的带柄铜镜的传播路线。

笔者以为，虽然西藏的带柄镜镜面与汉式镜构造有着某些相似性，但凸沿、中突并非汉式镜的独有特征。汉式镜虽在战国时代已向外部输出，如在塔加尔文化晚期（公元前4世纪），已经见于南西伯利亚地区，稍后更常见于匈奴文化墓葬中。<sup>⑤</sup>但这些输出汉镜中，都基本以其完成形态，少见以毛胚或者改制后的形态出现。更何况，在吐蕃以前的考古材料中，有关汉文化与西藏腹心地带物质文化上的交融并不明显，所以 Hüttel 提出的与汉镜的关联值得怀疑。赵惠民曾提出曲贡的带柄镜可能受到印度北部同类产品的影响，

① 霍巍：《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载《考古》1997年第11期。

② A. 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India, 1914, p. 73.

③ H. G. Hüttel, Archäologische Siedlungsforschung im Hohen Himalaja: Die Ausgrabungen der KAVA im Muktinath-Tal/Nepal 1991—1992, *Beiträ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14, 1994, pp. 47—147.

④ C. G. Seeber, Reflections on the Existence of Castles and Obersevation Towers in the area under Investigation, the South Mustang, *Ancient Nepal*, No. 136, 1994, pp. 80—87.

⑤ E. Loubo-Lesnitchenko, Imported Mirrors in the Minusinsk Basin, *Artibus Asiae*, Vol. 35: 1/2, 1973, pp. 25—61. 又可参见：李学勤：《论西伯利亚出土的两面汉镜》，《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上），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版；李学勤：《续论中国铜镜的传播》，《比较考古学随笔》，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4~103页。I. V. Filippova, Chinese Bronze Mirrors in Hunnu Culture,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Vol. 3: 3, 2000, pp. 100—107.

但其所举几例印度出土的带柄镜的形制<sup>①</sup>，仍然属于中亚早期素面带柄镜的系统，在镜体形制上与西藏的带柄铜镜仍存在不少差异。

综上所述，霍巍先生提出的观点最为可靠。本文即是遵循这一基本思考路径，对若干问题再做补充讨论。

## 二、欧亚草原及中国西部的早期带柄镜

世界范围内的古镜可粗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圆板状具纽的“汉式镜”系统，镜背中心多有用以穿线的鼻纽<sup>②</sup>；一是带柄镜系统，镜体和镜柄或合铸或柄部插套其中，两者的使用把持方式可能有所不同。<sup>③</sup> 中国至唐宋以后带柄镜才取代了具纽镜<sup>④</sup>，诚如既存研究指出的那样，西藏的这3面带柄镜显然与中国早期的具纽镜传统相去甚远，而与西方（希腊、印度、中亚）的带柄镜传统关系密切。可见，对于上述西藏带柄铜镜的认识，必须置于欧亚（特别是中亚）大陆的早期考古背景下讨论。

带柄镜早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已见于西亚，在欧亚草原最早见于在苏联中亚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如外阿姆河流域的阿尔定特佩（BC. 2300~BC. 2000）文化<sup>⑤</sup>、萨帕利文化（BC. 15000~BC. 1000）、巴克特利亚的贝西肯特文化（BC. 13000~BC. 1100）<sup>⑥</sup>、

① S. Srinivasa and I. Glover, the Archaeometallurgical Implications of new Findings of Traditional Crafts of making High Tin Delta Bronze Mirrors and Beta Bronze Vessels in Kerala State of South India, *Material Issues in Art and Archaeology*: Vol. V (M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 Symposium Proceedings Vol. 462; C. C. Lamberg - Karlovsky, Archeology and Metallurgical Technology in Prehistoric Afghanistan, India, and Pakist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69: 2, 1967, pp. 145-162. 有关印度早期铜镜的考古发现概述可参见: A. Ghosh (ed.), *An Encyclopedia of Indian Archaeology*,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1990, pp. 347-348.

② 这类镜中值得注意的是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墓地出土的双钮或多钮镜。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相关讨论参见: Won-Yong Kim, Bronze Mirrors from Shih-erh T'ai Ying-tzu, Liaoning, *Artibus Asiae*, Vol. 26, No. 3/4. (1963), pp. 207-214. 该文认为这类镜目前只发现于中国东北南部、朝鲜半岛以及日本西部,在整个欧亚草原都不见,十二台营子代表了一种“多钮镜文化”的起源地。我国学者乌恩也注意到此镜在东北亚地区的流布。参见乌恩:《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3页。

③ 参见 Judith Lerner, Horizontal-Handled Mirrors: East and West, *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 Vol. 31. (1996), pp. 11-40. 该文还介绍了第三种铜镜“平柄镜 (Horizontal-Handled Mirror)”,指镜背的桥纽达到了镜沿,这类镜起源于罗马,流行年代在公元1世纪至9世纪后传布至伊朗、中亚等地,其东向分布甚至到了越南的奥高 (Oc-Ceo) 遗址。今后中国境内是否有此类镜的分布,颇值得注意。另外,有关古代铜镜的讨论可参见 *Source: Not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No. 2/3 (1985) 上的专号,如 Juliano, "Possibl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irror," pp. 36-45, 认为中国铜镜的起源乃是南西伯利亚影响的结果。

④ 郑德坤先生《四川考古研究》一书中曾经将一例四川出土的带柄镜定为东汉,实际上这面带柄镜并不具有早期带柄镜的特征,而显然是在唐宋以后,参见 Cheng Te-k'un, *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Szechwan*, Cambridge, 1957, p. 153, pl. 62. 2.

⑤ A·H·丹尼、V·A·马松:《中亚文明史》第1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72~173页。

⑥ E. E. Kuzmina,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ndronovo and Metal Use in Eastern Asia, *Metallurgy in Ancient Easter Eurasia from the Urals to the Yellow River* (Edited by K. M. Linduff),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4, pp. 37-84; E. E. Kuzmina,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p. 103-105.

费尔干纳盆地的楚斯特文化(BC. 1500~BC. 1000)。<sup>①</sup>但在欧亚草原地带东部青铜时代文化中(如齐家、四坝、天山北路、塞伊玛-图宾诺文化、南西伯利亚的奥库列夫文化等)都未见带柄铜镜,即便稍后南西伯利亚地区青铜时代晚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BC. 1700~BC. 1400)、卡拉苏克文化(BC. 1400~BC. 1000)的铜镜也是以圆板具纽镜为主,不见带柄镜<sup>②</sup>。整体而言,带柄镜在欧亚草原大量登场是在早期铁器时代,即所谓“斯基泰时期(BC. 700~BC. 200)”<sup>③</sup>,乌拉尔山一带的游牧民接受了中亚南部农业部落的带柄镜传统<sup>④</sup>。如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南乌拉尔北高加索地区的萨马尔泰文化、咸海沿岸的萨基(Saka)文化、图瓦地区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木文化、蒙古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明尼斯可盆地的塔加尔文化(BC. 900~BC. 100)中,带柄镜在墓葬中比比皆是<sup>⑤</sup>,同时尚有较多圆板具纽镜。总体而言,带柄镜植根于中亚一带的青铜时代文化,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广泛流行于欧亚草原东西部。

参考中亚地区带柄铜镜的分类<sup>⑥</sup>,如果以柄部特点作为带柄镜的分类基点,则中国境内的带柄镜可分为四种类型:钮柄、长柄、动物造型镜柄、复合型镜柄。需要说明的是,此处关于带柄镜的分类主要参照既存研究所建体系,并略有调整。列举材料除既存研究已涉及者,尚补充了部分新考古材料。

#### 第一类,钮柄镜。

这类镜总体上可归属带柄镜。其特点是镜柄和镜身多为一次性合铸,但其柄部多不明显,有时十分短小,有时仅在镜缘伸出一小凸(Tang),凸出部位多见穿孔或者鼻纽<sup>⑦</sup>。

① Jianjun Mei & Colin Shell, *The Iron Age Cultures in Xinjiang and Their Steppe Connections*, *Ancient Interaction: East and West Eurasia* (Edited by K. Boyle, C. Renfrew and M. Levine),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2. pp. 213-234.

② 有关中国具纽镜起源的争论,参见: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载《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刘学堂:《新疆地区早期铜镜及相关问题》,载《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刘学堂:《新疆早期铜镜起源研究——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说》,载《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后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新疆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242页;梅建军:《关于新疆出土早期铜镜研究的几个问题》,《吐鲁番学研究: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251页;刘一曼、孔祥星:《中国早期铜镜的区系及源流》,载宿白主编:《苏炳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9~584页。

③ A. Yu. Alekseev, *A Chronology of the Scythian Antiquities of Eurasia Based on New Archaeological and C14 Data*, *Radiocarbon*, Vol. 43: 2B, 2001, pp. 1085-1107.

④ E. E. Kuzmina,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p. 103-105.

⑤ 参见 J. Davis-Kimball, V. A. Bashilov, L. T. Yablonsky,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Zinat Press, Berkeley, 1995. 一书中各章。

⑥ V. D. Kubrave, *Ancient Altaian Mirrors*,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Vol. 3: 11, 2002, pp. 63-77. 弗拉基米尔·库巴列夫:《亚洲游牧民族使用的铜镜是宗教考古学的原始资料》,周金玲译,载《新疆文物》2005年第1期。

⑦ 此类镜在地中海东岸的青铜时代遗址中也颇为常见,哈佛大学闪米特博物馆(The Semitic Museum)的“*Ancient Cyprus: The Cesnola Collection*”展览(<http://www.fas.harvard.edu/~semitic/hsm/FSCypBronzeAge.htm>)。

张文立先生曾对此类镜有过专门研究,并建议称之为“钮柄镜”<sup>①</sup>。此类镜在霍巍先生1997年的分类中称为B型镜。据张文立先生的梳理,这类镜在中国北方地区春秋战国墓葬中颇为常见,如辽宁凌源五道河子(M11:4)<sup>②</sup>、内蒙古凉城淳县窑子墓地(M22:6-1)<sup>③</sup>、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龙太匈奴墓<sup>④</sup>、甘肃临泽县濠洼村北山<sup>⑤</sup>、河北平山三汲<sup>⑥</sup>、和静察乌呼沟口二号墓地(M6)<sup>⑦</sup>、新疆巩乃斯羊种场(M5)<sup>⑧</sup>、新疆乌鲁木齐板房沟<sup>⑨</sup>等。另外,对于此类镜的研究而言,可能最为重要的是甘青河西走廊地区近年披露的考古材料中,也有此类钮柄镜的资料,如甘肃永昌县西岗、柴湾岗两处沙井文化时期的墓地曾出土约10件<sup>⑩</sup>。此类镜在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亦有不少发现,前揭张文立先生已列举了乌兰固木、图瓦、外贝加尔、米奴辛斯科等地的同类器物,此不赘述。

## 第二类,长柄镜。

霍巍先生1997年分类中的A型镜,其特点是镜面与柄部一次合铸,柄部一般为长条片状,其末端有时带穿孔。此类镜在新疆地区出土最多,如轮台县群巴克一号墓地(M34)、二号墓地(M4)<sup>⑪</sup>、吐鲁番艾丁湖<sup>⑫</sup>、鄯善苏贝希<sup>⑬</sup>、哈密五堡墓地<sup>⑭</sup>、拜城县拜勒其尔墓

① 张文立先生以河北平山出土的一件铜镜为引子,提出了一类与带柄镜关系密切的“北方系钮柄镜”。张文对钮柄镜的定义是:“一次性成器,镜体小,镜面圆形,缘外通常有一钮突或短柄,且多变化,镜背多素面,间或带有纹饰者。”但其在具体标本的归类上,标准不一,如该文所列举的带柄镜中的A型中就有不少例子和其钮柄镜难以区分。参见张文立:《平山三汲出土铜镜初识——兼谈北方系钮柄镜》,载《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1页。

②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五道河子战国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9年第2期。

③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城淳县窑子墓地》,载《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

④ 内蒙古博物馆等:《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龙太的匈奴墓》,载《考古》1977年第2期。

⑤ 施爱民:《临泽县濠洼村北山出土的青铜饰件》,载《陇右文博》1999年第2期,转引自张文立:《平山三汲出土铜镜初识——兼谈北方系钮柄镜》,载《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1页。

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平山三汲古城调查与墓葬发掘》,载《考古学集刊》(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193页。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等:《新疆和静察吾呼沟口二号墓地发掘简报》,载《考古》1990年第6期。

⑧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巩乃斯羊种场石棺墓》,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⑨ 乌鲁木齐文管所:《乌鲁木齐板房沟新发现的二批铜器》,载《新疆文物》1990年第4期。

⑩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西岗墓地出土带柄镜6件(M79:9, M54:6, M199:6, M224:6, 采01、采02)。柴湾岗出土四件(M23、M27、M50、M75)。这类带柄镜的共同特征都是镜面圆形,边缘无凸棱,镜柄很短,上有穿孔或者钮,镜柄镜面同此铸成,镜背素面,形制普遍较小,镜面直径在4厘米~8厘米左右。上述沙井文化中的铜镜出土时多有纤维痕迹或有附着有毛皮,推测随葬时多置于镜袋中,出土位置多在墓主人腰部以下位置,这与新疆以及欧亚草原地区古代墓葬中出土的铜镜的情形相似。

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等:《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墓葬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载《考古》1991年第8期。

⑫ 新疆自治区博物馆等:《吐鲁番艾丁湖墓葬》,载《考古》1982年第2期。

⑬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鄯善县苏贝希墓群三号墓地》,载《新疆文物》1994年第2期。

⑭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工作的新发展(1979—1989)》,载《文物考古工作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43~351页。

地<sup>①</sup>、新源县铁木里克墓地(M6)<sup>②</sup>、尼勒克县别特巴斯陶墓群<sup>③</sup>、克里雅河流域的于阇圆沙古城墓地<sup>④</sup>、塔城额敏县铁厂沟墓地<sup>⑤</sup>、乌鲁木齐阿拉沟墓地<sup>⑥</sup>、特克斯县恰甫其海<sup>⑦</sup>。目前年代较早的为哈密五堡墓地出土者,年代大致可定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后期的青铜时代晚期<sup>⑧</sup>。一些学者推断新疆带柄镜的出现可能与费尔干纳的楚斯特文化有关,因为轮台群巴克出土的两件带柄镜与达理维尔(Dalverzin)遗址出土的带柄镜的砂岩铸模的形制非常接近,带柄镜可能系新疆东部传入新疆南部地区<sup>⑨</sup>。至于此型镜的下限,当为西汉。在汉代的纪年范围之内,在新疆地区的带柄镜已经较少见到,汉式镜已经在墓葬出土物中占据主流。

### 第三类,动物造型镜柄。

此类镜的镜柄为动物造型,有时为动物的完全形象,有时仅为写意性的鸟兽头部,图像抽象化程度很高。这类镜在中国境内发现并不算多,依据笔者搜集的资料目前仅见于以下考古遗址<sup>⑩</sup>:内蒙古呼鲁斯泰<sup>⑪</sup>、新疆博物馆收藏1件<sup>⑫</sup>、新疆特克斯县恰甫其海水库叶什克里克<sup>⑬</sup>。另外,郑绍宗在列举长城地带的牌饰时曾发表旧绥远曾出土3件带柄牌饰,也应该为此类动物纹柄镜<sup>⑭</sup>。在鄂尔多斯,乌恩最近公布了1件桃红巴拉文化的带柄镜,镜柄为骆驼造型<sup>⑮</sup>,较为罕见。上述铜镜在欧亚草原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都是常见类型,

① 2007年7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陈列室所见。

②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新源铁木里克古墓群》,载《文物》1988年第8期。此墓出土带柄铜镜2件,经过科学检测,参见:梅建军、平尾良光、夏本淳子、高滨秀:《新疆伊犁地区出土的一面带柄铜镜的科学分析》,载《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1期。

③ 刘学堂、托呼提、阿里甫:《新疆尼勒克县别特巴斯陶墓群全面发掘获重要成果》,载《西域研究》2004年第1期。

④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法国科学院研究中心315所、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调查概述》,载《考古》1998年第12期。

⑤ 刘学堂、托呼提:《新疆额敏河流域发现早期游牧民族的墓葬》,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

⑥ 2007年7月新疆文物考古所陈列室所见。

⑦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学系:《特克斯县恰甫其海A区XV号墓地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5年第4期。凌勇、梅建军、吕恩国:《新疆伊犁地区出土史前铜器的科学分析》,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7卷3期,2008年。

⑧ 参见:梅建军、刘国瑞、常喜恩:《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笔者曾于2007年8月在新疆考古研究所陈列室见到实物。

⑨ Jianjun Mei & Colin Shell, *The Iron Age Cultures in Xinjiang and Their Steppe Connections*, *Ancient Interaction: East and West Eurasia* (Edited by K. Boyle, C. Renfrew and M. Levine),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2. pp. 213-234.

⑩ 另可参考:刘宁:《北方式动物纹镜》,载《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⑪ 塔拉、梁京明:《呼鲁斯泰匈奴墓》,载《文物》1980年第7期。原报告定为牌饰,这件铜牌饰据报道背后有钮,存疑。

⑫ 新博:《丝路文化的积淀:新疆博物馆馆藏文物精选》,载《鉴赏家》1998年第8期。

⑬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特克斯县叶什克里克墓地发掘报告》,载《新疆文物》2005年第3期。

⑭ 此3件为旧绥远一带出土,参见郑绍宗:《略论中国北部长城地带发现的动物纹青铜饰牌》,《文物春秋》1991年第4期,图56、图57、图58。

⑮ 乌恩:《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图版:桃红巴拉文化器物。

尤其是在阿尔泰地区的塔加尔文化中<sup>①</sup>。这种镜柄的动物造型设计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风格<sup>②</sup>，有时会在镜背有刻画或铸造的装饰纹饰，多以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纹为主<sup>③</sup>。考虑到阿尔泰地区野兽纹带柄铜镜的流行年代<sup>④</sup>，把这类铜镜在中国流行的年代定在公元前7—公元前2世纪应该较为恰当。

#### 第四类，复合型镜柄。

镜体与镜柄分铸或者合铸，镜柄普遍较短，多呈管状，且末端多有对穿，用以系挂，最显著的特征是镜柄与镜体结合部位常有一个类似杏仁状的铆钉结合位，有时镜柄为变形的动物造型。这类镜与上述第三类带柄镜有类似之处，但镜体与柄部连接方法差异较大。霍巍先生已指出这类镜多见于中国西南山地的春秋战国时代遗址中<sup>⑤</sup>，如云南德钦县永芝<sup>⑥</sup>、云南祥云县检村<sup>⑦</sup>、云南宁蒗县大兴<sup>⑧</sup>、四川茂汶别立勒石村<sup>⑨</sup>、四川荣经县烈太<sup>⑩</sup>。2005年公布简报的云南昌宁坟岭岗墓地也出土4件<sup>⑪</sup>，再次确认了川滇西部高原是这类带柄镜的集中分布区，霍巍先生著文讨论过的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购藏的两件圆板型短柄镜基本上可确认出于这一地区<sup>⑫</sup>。此外，最近出版的盐源青铜器报告书中也公布了一件此类带柄铜镜。<sup>⑬</sup> 上述此型铜镜多出土于土坑墓或石棺葬中，年代大致可定在东周。

上述三类带柄铜镜中的第一、二、三类，都是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以至早期铁器时代常见的类型，其在中国的出现显然是受到了欧亚草原铜镜传统的直接影响。而第四类铜镜则显得较为特别，可能属于受到上述欧亚草原传统影响下，中国西南早期铁器时代畜牧部落的地方性创造。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几类铜镜在使用方法上亦可能存在差别，如第一类镜仅带凸部而有穿孔者，可能是穿绳系挂而不需接续柄部；第二类铜镜的中长柄则可能不需要接续柄部，直接使用，而稍短者则需要接续柄部；至于第三、四类铜镜，从其形制考虑，则不需接柄而直接使用。

① V. D. Kubrave, *Ancient Altaian Mirrors,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Vol. 3: 11, 2002, pp. 63—77. 其中 Fig. 5、Fig. 6、Fig. 8 列举的诸多此类镜。

② V. D. Kubrave, *Ancient Altaian Mirrors,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Vol. 3: 11, 2002, pp. 63—77.

③ 本文是在宽泛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的，并未涉及欧亚草原各区域动物纹饰的地方性差别。有关这一概念的讨论参见：邵会秋、杨建华：《早期斯基泰文化及欧亚草原的动物纹起源问题的探讨——从〈斯基泰—伊朗动物纹风格的起源〉一文谈起》，载《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以及 L. T. Yablonsky, “Scythian Triad” and “Scythian World”, *Kurgans, Ritual Sites, and Settlements Eurasian Bronze and Iron Age* (Edited by J. Davis—Kimball, E. M. Murphy, L. Koryakova and L. T. Yablonsky), BAR, 2000, pp. 1—8.

④ 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载《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

⑤ 霍巍：《从新出考古材料论我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载《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

⑥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载《考古》1975年第4期。

⑦ 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云县文化馆：《云南祥云检村石椁墓》，载《考古》1983年第5期。

⑧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宁蒗县大兴古墓葬》，载《考古》1983年第3期。

⑨ 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别立、勒石村的石棺墓》，《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

⑩ 李晓鸥、刘继铭：《四川荣经烈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载《考古》1984年第7期。

⑪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昌宁坟岭岗青铜时代墓地》，载《文物》2005年第8期。

⑫ 霍巍：《从新出考古材料论我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载《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

⑬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第140页，图版三四：2。



### 三、讨论

比较上述类型，就形制而言，西藏出土的带柄铜镜在中国境内的同类材料中显得相当独特。除了带柄这一共同特点之外，其在柄部设计、镜面形制等方面与其他地区的带柄镜区别较大。如三面铜镜镜背微凹，镜面略微突起，镜缘有明显的凸棱，镜背中心有一尖突，镜缘有特别设计的基座连接镜柄。从上述特点检讨，西藏的带柄镜与欧亚草原的带柄镜的柄部做法完全不同，也与新疆西北与新疆地区的带柄镜关联性较差，与青藏高原东部山地的带柄也仅有微弱相似之处。而从曲贡遗址以及青藏高原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积累的考古材料来看，我们基本可以排除这3面铜镜属于西藏本地制作的可能性。

从形态上考虑，类似的边缘突起、中央有圆锥的铜镜在中亚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中也曾经出土过。1978年，苏联考古学家萨里阿尼迪（V. I. Sarianidi）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北的西伯尔汗发掘了1处贵霜早期墓葬，年代在公元前后。<sup>①</sup> 6座墓葬出土了21000件黄金制品，其中发现6面铜镜，3面为汉镜，3面为带柄镜（M3、M5、M6）。其中1件带柄镜镜背边缘突起呈圆棱状，中央有突起呈圆锥，镜面直径14.5厘米（图一：4）<sup>②</sup>。另据介绍，在阿富汗北部Kunduz一带曾出土的1件带柄青铜镜，镜柄和镜面合铸造，镜柄很短，可能需要插入象牙、木质的延长镜柄使用<sup>③</sup>，镜背边缘有一道突起，且中心部位有圆突，镜面直径在14.6厘米。在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Pazyryk）墓葬中曾出土一批铜镜，但多数有关铜镜的介绍和讨论都集中于六号墓中出土的汉山字纹镜。实际上，在这面铜镜之外，还有一些带柄铜镜。苏联考古学家鲁金科曾经介绍过2号墓中出土两件带柄镜<sup>④</sup>。1件为铜质，柄部包裹兽皮并置于1个皮质的镜袋中，属于中亚地区较为常见的短柄铜镜，背面素面无纹。另外1件镜面为银质，出土时置于一件皮袋中。这面镜的镜面直径为15厘米，镜面为两层以铆钉结合而成，铆钉都置于镜面外缘，镜面光滑，中心有圆突，其外侧有凸棱，镜面最外侧亦有1道凸棱。最重要的是镜背刻有纹饰，在镜背的两道凸棱之间，有12道线刻重圈，重圈之间以阴刻折线纹填充，X光分析显示原配镜柄与镜身乃为一次性合铸，插入一八棱形的牛角管中。尽管在发掘者鲁金科看来这面银镜相当独特，很难找到同类。但这面带柄镜显然并非阿尔泰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本地传统，而与中亚一带的带柄镜有着密切关系。上述几面铜镜年代都大致可断在公元1世纪前后，其镜柄形制与欧亚草原地带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广泛流行的铜镜有着较大差异，虽然目前尚未见找到柄部与西藏铜镜完全类似的例子，但笔者认为这种镜身和镜柄分离而不是

① V. I. Sarianid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From the Tillya-tepe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Afghanistan*,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85; F. Hiebert and P. Cambon (eds.), *Afghanistan: Hidden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 Kabul* (2008), National Geographic, Washington, D. C., pp. 219-292.

② V. I. Sarianidi: 《黄金遗宝》，加藤九祚译，东京：岩波书店，1988年版，图版20，第64页；图版63，第164页；图版70，第178页。本文所使用铜镜照片来自 [http://www.hp.uab.edu/image\\_archive/ucd/mirror02.jpg](http://www.hp.uab.edu/image_archive/ucd/mirror02.jpg)

③ K. Fischer, Preliminary Notes on Some Ancient Remains at Qunduz, *Afghanistan*, vol. XVII, pp. 12-26. 转引自 W. Trousdale, A Chinese Handle-Bearing Mirror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Artibus Asiae*, Vol. 24, No. 1, 1961, pp. 11-19.

④ S.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Translated by M. W. Thomps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p. 114-115, Plate. 70.

合铸的传统,很可能受到中亚南部一带的影响。当然,此点尚需更进一步的梳理对比。

再从镜背纹饰而论,西藏出土的3面带柄镜即使在整个欧亚大陆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考古中,都显得相当独特,很难找到与之类似者。3面铜镜的镜背纹饰虽然各不雷同,但构图模式以及装饰要素则具有共性,如3面铜镜背面装饰纹样的构图程式上为一种从中心向边缘层层扩展的重圈纹装饰风格,镜背纹饰分为三个部分:内圈(中心纹样)、外圈(装饰辅助纹样、勾连S纹、折线纹)、中圈(辅助纹样)。在镜中心与镜沿之间的重圈内饰有首尾衔接的勾连S纹是3面铜镜背面装饰中共见的要素,尤其是拉萨曲贡和法国私人收藏家手中的铜镜,其镜缘的最外圈亦为一条凸棱,凸棱内的圈状装饰纹带都装饰以大勾连S纹,基本雷同。

在欧亚草原青铜至铁器时代考古中,铜镜装饰线刻或者浮雕图像的例子并不鲜见。<sup>①</sup>铜镜镜背及镜柄上刻画动物形象,或为单体的猫科动物,或鹿、山羊、公羊、骆驼、马等草食动物,或抽象的鸟类形象。总体上,装饰纹样主要以流行的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纹为特征。镜背刻纹者多见于库巴若夫所划分的I型和II型镜,极少见于边沿有突唇、中央有把纽的铜镜,而是更多见于“勋章型”的带短柄镜。但西藏境内发现的3面铜镜上的刻纹主题,与欧亚草原镜背刻画纹铜镜中表现动物撕咬的“叙事性”场景型场面不同,而是一种几何符号化的向心构图,“容易在视觉上造成虚幻效果”<sup>②</sup>。

与西藏的带柄镜镜背刻纹相似的例子,可以举出欧亚草原考古发现的几件在考古学家看来“十分独特”的带柄铜镜。这类带柄镜无论从形制还是镜背纹饰设计上都与欧亚草原常见的带柄镜差异较大,但发现数量不多。如库巴若夫曾讨论过1件从阿尔泰边疆省的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鄂毕河盆地Bystrovka遗址中发现的铜镜,其中心是一个六边形构图,外围有三重圈,第一圈和第二圈之间刻绘有三只首尾相接的老虎(图一:5),库巴若夫认为在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风格中没有与之直接类似的写实老虎图像,其可能源于伊朗或者中亚的同类母型。虽然从纹饰上来说,Bystrovka铜镜中心为两个同心圆包围的六角形几何纹和许多萨尔马提亚铜镜中心的“六瓣玫瑰花纹”非常相似,在形制上也可证实其源自萨尔马提亚<sup>③</sup>,但库巴若夫认为其可能是根据阿尔泰草原的原型仿制的,例如在阿尔泰的Rogpzhikha(图一:6)、Lokot(图一:7)、南乌拉尔的Mechetsai(图一:8)墓地也有类似的铜镜发现<sup>④</sup>。上述这几面铜镜在结构(两个外部镀金的铜质或者银质的铆钉)、尺寸(14厘米~15厘米)、图式、艺术风格等方面,都与欧亚草原常见的带柄铜镜不同,而与西藏腹心地带藏南河谷发现的3面带柄镜在形制与纹饰风格上类似,都属于向心重圈扩展构图,中部都有一个突起的尖纽,在中心圆纽之外,至少有两重高出镜背的凸棱。本文并非认为其与西藏的3面带柄镜有着直接关联,但认为俄罗斯考古学家将其来源追溯至中亚一带是值得充分注意的。

另外,据《印度考古百科全书》介绍,1951年,考古学家马歇尔爵士曾在巴基斯坦

① 库巴若夫指出镜背纹饰较少见,可能与铜镜背面的除锈工作有关,大多数考古学家喜好以带着锈斑的方式展出青铜器。例如西藏曲贡的铜镜在第一次发表时候,并没有注意到镜背的纹饰。

② N·G·容格、V·容格、H·G·希特尔(朱欣民译)《西藏出土的铁器时代铜镜》,朱欣民译,载《西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89页。

③④ V. D. Kubrave, *Ancient Altaian Mirrors,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Vol. 3: 11, 2002, pp. 63-77.

的塔克西拉斯卡普遗址发掘土有近二十多件铜镜，其中不乏带柄者，据描述：“这些铜镜的直径在 5.5 厘米~16.5 厘米，镜背有一个小柄部，可插入象牙或骨、木质的手柄，镜面平滑微凸，镜背有些素面无纹，但更多装饰凸出的波纹边棱，且中部有突纽，这些带柄镜一般并不像希腊铜镜那样常有阴刻或浮雕装饰纹样，但其中一件很特别，镜背雕刻了两个相对的鸟纹，斯卡普出土的另外一面铜垂饰上也有同样的纹饰，但设计相对简单。”<sup>①</sup>

从此处的描述可见，塔克西拉在存在带柄镜，且在镜背纹饰上与西藏带柄镜相似之处，尤其是其所言的“对鸟”纹饰，更让人联想到曲贡所出带柄镜镜背所刻之对鸟。<sup>②</sup> 考虑到斯卡普王宫的年代跨度较长，且属于该遗址包含很多外来文化因素<sup>③</sup>，其间联系尚有待研究。但由于资料条件所限，未见到此处所言及的铜镜图版，有关斯卡普出土铜镜的具体细节仍不明了。关于镜背的鸟纹装饰，尚可举出库巴若夫曾提到的一面出自乌兹别克斯坦 Kaskazhol 遗址的带柄镜，镜背有 4 圈纹饰，中间为一立鸟形象<sup>④</sup>。

另外，铜镜的合金成分也颇值得注意。曲贡遗址出土的青铜镜曾经梅建军等先生做金相检测，结果表明这面镜是铜锡二元合金，且锡含量平均值为 36.35%，铅含量在 0.8% 左右，不足 1%，为高锡青铜。<sup>⑤</sup> 德国收藏的藏南河谷发现的铜镜的金相分析结果则表明此镜为铜锡二元合金，其中的锡含量为 25.46%，铅含量为 0.836%，亦不足 1%。<sup>⑥</sup> 这说明这两面铜镜都可归为铜锡二元合金，铸造技术属于一个传统，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两面铜镜属于同一时期。近年来，梅建军先生等人对新疆地区出土早期铜镜做过金相检测<sup>⑦</sup>，目前有 16 件铜镜公布了金相分析资料<sup>⑧</sup>。其中带柄铜镜有 6 件，分别出自和阗克里雅、新源铁木里克以及特克斯县恰甫其海墓地，除克里雅所出者为纯铜质外，铁木里克、恰甫其海所出者皆为铜锡合金，其锡含量在 20.8%。与之相比，西藏所出的两面带柄

① A. Ghosh (eds.), *an Encyclopedia of Indian Archaeology*, New Delh: Munshiram, 1989, pp. 347-348.

② 王尧先生曾指出，吐蕃时代对“飞鸟的灵异性，有特殊的敏感，常常根据飞鸟飞向，鸣声和食物来占吉凶”，如《旧唐书》卷十九东女国条：“其俗每至十月，令巫者赍糒诣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而有鸟如鸡，飞入巫者之怀，因剖腹而视之，每有一谷，来岁必登，若有霜雪，必有灾异，其俗信之，名为鸟卜。”限于目前西藏考古现状以及具体考古系络的限制（3 面铜镜中的 2 面都是采集品），西藏曲贡带柄铜镜上刻画的对鸟图像，是否与西藏苯教中的鸟卜有关尚待探讨。王尧、陈践：《吐蕃鸟卜研究——P. T. 1045 号卷子译解》，《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论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第 96~102 页。

③ A·H·丹尼：《历史之城塔克西拉》，刘丽译，陆水林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52~184 页。

④ V. D. Kubrave, *Ancient Altaian Mirrors,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Vol. 3: 11, 2002, pp. 63-77.

⑤ 此处有关曲贡铜镜的合金问题曾通过电子邮件向北京科技大学梅建军教授请教，承梅教授悉心解答有关疑问，谨致谢忱。另外，根据金相分析，曲贡 M203 表面并不含金、银、汞，表明镜体未经镏金镏银处理，这与原先发掘者与研究者的认识差别很大。容格等人撰写的论文中表述德国所见的铜镜也是经过镏金处理，但在其文所提供的金相分析中也不见金银成分。

⑥ N·G·容格、V·容格、H·G·希特尔：《西藏出土的铁器时代铜镜》，朱欣民译，《西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年。

⑦ 梅建军、刘国瑞、常喜恩：《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载《西域研究》2002 年第 2 期；梅建军、平尾良光、夏本淳子、高滨秀：《新疆伊犁地区出土的一面带柄铜镜的科学分析》，载《吐鲁番学研究》2003 年 1 期，第 81~87 页；梅建军：《关于新疆出土早期铜镜研究的几个问题》，《吐鲁番学研究：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46~250 页。

⑧ 凌勇、梅建军、吕恩国：《新疆伊犁地区出土史前铜器的科学分析》，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27 卷 3 期，2008 年版，第 359~369 页。

镜都属于高锡青铜。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西藏的带柄镜很可能并非直接来自新疆,而可能另有所源。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铜锡二元合金的带柄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疆地区其他遗址出土的4面圆形具钮镜则为铜锡铅三元合金。梅建军指出,这可能与公元前第一千纪后半期新疆部分地区的铜镜收到了中原铜镜传统的影响。Huttel亦曾指出,大致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南亚、中亚的带柄铜镜也开始发展为背面全部或部分陡然凸突的样子,他估计与汉镜西扩有关<sup>①</sup>,此认识与梅建军有关新疆铜镜合金比例变化的观察颇为一致,表明大体在西汉前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汉镜西渐,逐渐影响到欧亚草原带柄镜的形制与装饰改变。

#### 四、结语

诸多既存研究都指出,目前中国境内考古出土的带柄镜多集中分布于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河西走廊地区、青藏高原的东缘部分。现今积累的考古材料,已经多次证明上述地区在早期铁器时代和欧亚草原的游牧文化有或明或暗的联系,整体上考虑西藏青铜镜和欧亚草原地区的同类器物的联系应该大致不差。首先,诚如霍巍先生指出的那样,它与欧亚草原带柄镜同属一个大的系统,具有某些北方游牧文化的特点。<sup>②</sup>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欧亚草原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带柄镜本身也有区域与时代的差别,这一点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带柄铜镜上同样也表现出来。

本文所讨论的3面西藏出土的带柄镜,虽装柄使用方法上从大的系统来看,属于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但考虑到形制以及镜背刻纹因素,其具体来源则显然要复杂得多。笔者认为,西藏的带柄铜镜可能并非自西藏北部的新疆直接输入,而很可能自中亚南部或印度北部一带经西藏西部传入,其年代不会早于西汉。更有可能,西来的带柄镜原物经过了西藏本土艺术家的改造,使得镜背装饰显得极为复杂。如科学检测报告指出:“点状花纹是由不规则的小凹坑组成的,凹坑内沉积有玷污物。这些凹坑深浅不一,排列亦不规范,显然是铜镜制成后,用手工凿刻成的。”<sup>③</sup>这表明,此件铜镜的纹饰并非如汉镜那样是由模范制作的,而是成型后经过了手工雕刻的再处理。如同阿米·海勒指出,吐蕃时期最为杰出的作品都是融合了各地不同风格而创造出来的<sup>④</sup>,西藏早期的带柄铜镜估计也不例外。

另外,有关西藏带柄铜镜的意义也十分值得关注。古代墓葬中铜镜的功能和含义,已

① N·G·容格、V·容格、H·G·希特尔:《西藏出土的铁器时代铜镜》,朱欣民译,《西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199页。

② 霍巍:《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载《考古》1997年第11期。

③ 梅建军、韩汝珍:《曲贡遗址M204出土铁柄铜镜的分析鉴定》,载《拉萨曲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254页。

④ 阿米·海勒:《拉萨大昭寺藏银瓶——吐蕃帝国(7世纪—9世纪)银器及服饰考察》,杨清凡译,《藏学学刊》第3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223页。

经有多位学者指出<sup>①</sup>。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墓葬中，带柄铜镜也是常见之物，库巴若夫提出，“古代游牧民族中，铜镜具有巫术、丰产、避邪的属性，并且是礼仪场合的必要象征，能够在死者和祖先居住的身后世界建立起神圣的精神联系。根据古代阿尔泰游牧人的传统丧葬礼仪，铜镜（或者其模型）不仅给予女人，同时也给予男人和儿童”<sup>②</sup>。就曲贡铜镜的出土地点来说，将其纳入西藏本土的文化环境中讨论较为适宜。不少学者已经指出西藏苯教和萨满教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内贝斯基认为，“我们比较西藏的巫师使用的带有萨满教成分的法器和道具时，我们发现了很多惊人之处”<sup>③</sup>。例如，“戈丹尔人和布鲁特人的萨满戴的另外一种重要的道具就是所谓陶利（Toli）：一块挂在胸前或护在背面的铜镜。据说‘陶利’最初是从抵御邪魔的盾牌演变而来的，西藏巫师挂在腰上的镜子和代言神巫使用的能传达神语的圆铜镜与陶利性质也大致相同”<sup>④</sup>。可见，如同在西伯利亚一样，铜镜在西藏萨满文化中也是一件重要的通神道具。限于西藏考古资料的限制，目前对此尚不能解释更多。

#### 附记：

拙文于9月14日定稿、投寄本刊后，9月30日参加了俄罗斯考古学家 Yaroslav V. Vassilkov 教授在哈佛大学梵语与印度学研究系做的一次学术讲座，题目为：Pre-Mauryan “rattle-mirrors” with artistic designs from the Scythian burial mounds of Altai in the light of the Sanskrit sources（阿尔泰地区斯基泰墓葬出土的前孔雀王朝时代刻纹响镜兼及梵文文献）。令笔者颇感兴奋的是，Vassilkov 教授所讲主题与拙文十分接近。他列举讨论的也是拙文提及的4面出于欧亚草原的带柄镜（巴泽雷克、Rogpzhikha、Lokot、Mechetsa）。但特别的是，Vassilkov 认为这几面镜均可摇响，且镜背纹饰与印度早期艺术关系密切。结合孔雀王朝石刻等印度早期艺术题材以及成书于11世纪的梵文典籍《故事海》（*Kathasaritsagara*），Vassilkov 教授认为上述几面铜镜可能系印度孔雀王朝时期的“响镜”，反映了印度北部与阿尔泰斯基泰王室的早期交流。虽然此类镜在印度还尚未被发现过，很可能系印度工匠专门为斯基泰王室制作，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笔者在讲座后向 Vassilkov 教授请教了有关西藏发现的这几面带柄铜镜，他认为这几面铜镜与他所列举的铜镜关系密切，将之一并讨论并不意外，但从镜背纹饰的差异而言，其间联系还待进一步廓清。

2009年10月1日

<sup>①</sup> V. D. Kubrave, *Ancient Altaian Mirrors,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Vol. 3: 11, 2002, pp. 63-77. 弗拉基米尔·库巴列夫：《亚洲游牧民族使用的铜镜是宗教考古学的原始资料》，周金玲译，载《新疆文物》2005年第1期。霍巍：《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载《考古》1997年第11期。I·V·菲利波娃（郑文译）：《铜镜在匈奴宗教仪式中的作用》，载《文博》2007年第2期。

<sup>②</sup> V. D. Kubrave, *Ancient Altaian Mirrors,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Vol. 3: 11, 2002, pp. 63-77.

<sup>③</sup> [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关于西藏萨满教的几点注释》，谢继胜译，《西藏的神灵和鬼怪》，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1页。

<sup>④</sup> [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关于西藏萨满教的几点注释》，谢继胜译：《西藏的神灵和鬼怪》，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4页。